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

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第597期

八月

□ 黑 塞

现在已是盛夏时节，几个星期以来，窗外高大的夏玉兰树已经进入了花期；它是南方夏天的象征，它开花的方式看似漫不经心、沉静缓慢，实际上却是迅速而丰饶的。这些雪白的巨大花萼，无论何时，都只有少数几朵，最多八朵或十朵一次性同时开放，因此在两个月的花期里，这棵树实际从外表看总是一样的，这些极为美丽的巨大花朵生命非常短暂：一般不会超过两天。大多是在清晨时分，它们会从淡绿色的蓓蕾中开出，纯白的花朵飘浮着，显得那么神奇而虚幻，像雪白的阿特拉斯山脉一样反射着阳光，整整一天，它们青春且亮丽地悬浮在乌亮坚硬的常青树枝叶间，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变色，边缘变黄，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带着令人动容的屈服和疲惫的表情衰老，而这衰老的过程也仅仅只持续一天。然后，白色的花朵已然变成了淡淡的肉桂色，昨天还像阿特拉斯山脉一样雪白的花瓣，今天感觉像精致、柔滑的魔皮：一种梦幻美妙的织物，像呼吸一样轻柔，但又有坚实甚至粗糙的质地。就这样，我的大玉兰树日复一日地绽放着纯洁、雪白的花朵，但看上去总是同一副模样。一般细腻、沁心、可人的香气，让人想起新鲜柠檬，但更甜津津，从花朵飘进我的书房。

夏天的大玉兰树（不要和北部地区很常见的春玉兰混淆）并不总是我的朋友，尽管它很美。在有些季节里，我会带着疑虑甚至敌意来看待它。它不断生长，在与我为邻的十年间，它伸展得过于庞大，以至于在春秋季的几个月里，遮蔽了阳台上本已稀疏的晨光。他已经成了一个巨人；在他蓬勃、茂盛的生长过程中，我常常把他当成一个快速长高，毛糙且略微瘦弱的男孩。而现在，正当盛夏花期，它庄严地矗立着，充满了温柔的尊严，在风中摇曳着坚硬、闪亮，仿佛上了漆的叶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它娇嫩、过于美丽、过快凋谢的花朵。

与这棵开着硕大白花的大树形成对比的是一棵矮小的树木。它栽种在我阳台的一个花盆里。这是一棵粗壮的矮树，是柏树的一种，还不到一米高，但差不多已有四十岁的树龄了，是一个长满节疤、自信满满的小侏儒，有点亲切，又有点滑稽，充满尊严，又古灵精怪，引人发笑。他是我最近才收到的生日礼物，这会儿他站在那儿，舒展着个性的枝条，这些只有手指长的枝条仿佛被几十年的暴风雨折磨得虬曲不堪，他满不在乎地瞧着对面的巨人兄弟，而后者的两朵花便足以遮住这个庄重的侏儒。他却不以为意，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粗大的巨人兄弟，而后者的一片叶子就有他所有树枝一般大。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雄伟感，他深思着，完全沉浸其中，显得那么年老，就像人类世界的侏儒那样，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古老和永恒的感觉。

由于夏天的酷热，我们已经被困住好几个星期了，我几乎无法外出。我将百叶窗紧闭，在几个小房间里饮食起居，以巨人和侏儒这两株树为伴。在我看来，巨大的木兰花是一切生长和旺盛繁殖的象征，是一切顺应本能和自然的悠闲自在生活的呼唤。毫无疑问，沉默寡言的侏儒属于相反的一极：他不需要那么多空间，他不挥霍，他努力追求强度和持久，他不是自然而是精神，他不是本能而是意志。亲爱的侏儒，你是那么古怪而谨慎，坚韧而古老！

健康至上，崇尚效率和轻率的乐观主义，谈笑间拒绝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怯懦地回避尖锐的质疑，享受当下的生活艺术——这是我们时代的口号，希望以此方式来掩盖世界大战的沉重记忆。过度的无忧无虑，模仿美国明星稚气的装扮，过度的愚蠢麻木，让人难以信服的幸福和灿烂笑容，这些都是乐观主义的风气。每天都用灿烂的鲜花、电影新星的照片、创纪录的数字来粉饰。所有这些伟大都是瞬间的，所有这些照片和数字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之后便无人问津，因为总有新的代替。这种过于夸大、愚蠢的乐观主义，将战争、苦难、死亡和痛苦解释为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蠢事，拒绝关心任何忧虑或问题——这种以美国为典范、脱离生活的乐观主义，刺激了我们的思想，迫使它走向这股极端夸大、加倍的批判、更深的疑难，以及对整个树莓色儿童世界观充满敌意的否定，就像在流行哲学和画报里所反映的那样。

就这样，我坐在这两位树木邻居中间，一位是生机勃勃的**美妙**玉兰树，另一位则是脱离物质、精神化的奇异侏儒，观察着这场对现实的表演，思考着，在炎热的天气里打一会儿盹，抽一会儿烟，直到傍晚到来，森林送来凉爽的气息。

（摘自北京文学公众号）

“最后一块肉难吃”

□ 俞鸿虎

父亲在世时喜欢说笑，经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哪怕再困难，欢声笑语也常充满着客堂间。

当年吃肉凭票，一周最多只有一顿解解馋。记得一个周日，晚饭吃得差不多时，菜碗里还剩下最后一块肉，油光光的吸引我和弟妹眼球。大家都想吃，可又不好意思再动筷子，因为我们都吃过一两块了，而父母只夹了点碎肉。平日常有啥好吃的父母亲总是省给我们吃，让长身体的我们多吃点。可这次我们都想让父母吃这最后一块肉。场面有点僵。这时，父亲一反常态，乐呵呵地笑了：“常言道，‘第一句话难说，最后一块肉难吃’喔。”话毕，把最后一块肉送进嘴里，动作干净利落，略带夸张。

当时，我们以为只是父亲酒后露憨态，为吃这最后一块肉，找点理由好下台罢了，兄弟姊妹四个笑过一阵了事。如今自己已退休十多年，仔细回想，父亲的话和举动，其实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有很多层意思。每每忆起，都回味无穷。

（摘自2024年8月22日《新民晚报》）

窗前种冬瓜

□ 心 庭

父亲喜欢在窗前种冬瓜，一溜儿十几棵，间距也大。长出几片叶子，父亲会顺着房檐搭起又高又结实的木架子，每根木头衔接处，都用铁丝牢牢拧紧。冬瓜爬蔓了，肥实的叶子间抽出粗茎蔓，因为重力，它自己缠不上粗木架。晨光里，母亲用布条帮它绑缚上，一节一绑，一棵一绑。高处的，父亲帮忙。

牵引上架后，冬瓜们“蹭蹭”生长，蓬勃之势不可阻挡。待我发觉，粗茎大叶已铺满了架顶，攀上了屋檐。是什么时候开始蓄力生长的呢？从第一朵冬瓜花绽放时起吧？一棵棵冬瓜，毛头小子一样，互相奋力追赶着，血气方刚的青春，虎虎的少年郎！

整个暑期，窗前的冬瓜架上碧叶重叠交错，藤蔓粗若缆绳，宛如在檐下扎了个凉棚。人在架下走，阴凉又通风。有时母亲会在棚下择菜，也会和邻居唠嗑。小孩子在架下嬉闹着游戏，捉昆虫。

母亲养的花草也搬到了架下，躲开了炙晒，红黄浅紫的花笑颜似地开。暑热当头，窗前却是郁郁生凉之境，连带室内都是清凉的。架上垂挂的一个个大冬瓜更喜人。总感觉父亲种的冬瓜像大美人，水桶腰，却窈窕，淡绿的表皮蒙一层白霜，显得肤白貌美。母亲说，那是成熟了，没长开的冬瓜表皮是一层霜针，扎人。我赶紧找个半大的冬瓜看，果然一身刺，银亮亮的，像无数微小的矛，随时防御或攻击。父亲说，冬瓜跟人一样，毛头小子愣头青，成熟后性子就温和了。

架上结的冬瓜越来越多，个头也越来越大。父亲就用草绳编个套兜，从冬瓜底部网住，冬瓜们更撒欢长了。父亲种的冬瓜个头真大，切一块一家人就能吃一顿。那时还没有冰箱，左邻右舍过来串门，赶上谁母亲就送给谁。那人就说：“哎呀，给太多了！他婶子，扎人了，真吃不。”嘴里客套着，手里却接着。母亲知道，不种冬瓜的，稀罕着呢。

于是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母亲笑呵呵地送人出去，邻居托着切成块的冬瓜笑着往外走。走到院子中央，邻居忽停下来，望着我家院里的菜啊花啊跟母亲又聊上了。好容易到了大门口，还得回身唠几句，最后一句肯定是：“快回去做饭吧，不耽误你了，我也赶紧做饭去。”

进了回去，冬瓜还是不见减产地长。炒冬瓜、炖冬瓜、冬瓜汤，还有冬瓜馅的包子和饺子，足能吃小半年。一直到了霜降，到了立冬，冬瓜算是收尾了，该摘的摘，该清的清。母亲说，厢房阴凉，把冬瓜搬里面存放，差不多可以吃一冬了。我后来才明白，父亲为啥爱把冬瓜种窗前了，因为它几乎占不了多大的地儿，还丰产，也明白了父亲当年搭那结实木架子的用心，因为小竹竿承载不起大枕头。

（摘自2024年8月13日《今晚报》）



夏天往事

□ 熊宗俊

若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季节？我会毫不犹豫地
说：夏天。因为夏天有着两个月漫长而又短暂的暑假，这个假期是任何学生都无法抗拒的快乐时光，我也不例外。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正是下河游泳的好时候。那时候，我们县城还没有游泳池，游泳通常是去一个叫“沙河”的地方。顾名思义，那是一个开挖河沙的河滩，上游筑起了水泥坝，河坝蓄了水，形成一片较深的河水。每天下午五六点钟，河坝上陆陆续续汇聚来游泳的人，乌泱泱的一大片。每年夏天，河里都会发生溺水事件，淹死的大多是玩水的孩子，但那依然阻挡不了我游泳的渴望。一般我是跟父亲一起来游，他水性好，能在水中摸鱼。如果他没空，我只好跟着邻居家的孩子，由他家的大人带着一起游。

夏天也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打记事起，我家老屋门前就有一棵枣树，枣树并不粗大，却有着茂盛的枝丫，浓密的枝叶中，挂满玻璃球大小的脆枣。八月是枣子成熟的季节，我喜欢在午后爬到树上，摘几把又大又红的鲜枣解馋。有时一不小心胳膊就被黄黄的毛茸茸的“痒辣子”蜇得又痒又辣，但一吃起枣来，什么疼都忘了。

令我怀念的，是枣子收获的时节，那也是我们的全家总动员：祖父站在门前望着我们，父亲搬来梯子，我和小伙伴就爬上树干，手扶枝丫，手脚同时发力，不停地摇晃着树干。随即噼里啪啦枣雨骤下，满地滚动着红红绿绿的鲜枣。祖母和母亲早已在地面，铺好了破床单。这时街坊邻里们也来帮忙，捡拾散落四处的枣子，并一把把装进我们准备好的袋子里。摇完树干后，叔叔手挥长竹竿，向着枣树最顶端一通乱打。枣雨又下，下面拣枣子的孩子，不禁又冲进那阵枣雨里，被砸得欢呼雀跃。满满几大袋子的枣子，怎么能一家人独享呢？于是，父亲叫我们孩子把这些脆枣挨家挨户分给街坊亲戚们。

夏天的雨，往往来得猝不及防，却又在意料之中。一个沉闷无比的下午，天渐渐暗了下来，一阵风吹过，窗外闪过一道电光，接着天边传来一声霹雳，刹那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屋顶瓦片上噼里啪啦，仿佛要被砸穿一般。此刻，在菜园劳作的父母，估计已经开始往家里赶了。三姐在家做晚饭，她会叫我带上两把雨伞，去给父母送伞。若是在半夜，我会在睡梦中被屋顶的雨声惊醒，母亲来到我床前问，哪里在漏雨？然后拿出她手上的脸盆或罐子接水。安置妥当后，她再去找盆盆罐罐接她房里的漏水。有时雨下得又大又急，母亲只好把我床上打湿的被褥掀起来，在枕头旁放个罐子，在脚下搁个盆子，于是我就这样歪着头，缩着腿，伴着哗啦啦的雨声，继续做我的美梦。

第二天若是天晴了，父亲必然会架上梯子，爬上房顶检修。由于我还小，身体较轻，父亲就叫我走到房顶上漏雨的地方，查看一下瓦片，有没有开裂破损，要不要添加新瓦。我得意地像个会轻功的少侠，小心翼翼地走到漏雨的位置，认真完成父亲交给我的重任。

其实，夏天的假期，最令我留恋的，还是自己卖雪糕挣到钱后，数钱的那份喜悦。又是一年夏天，可我再也回不去那个有暑假的日子了。父母已离我而去，那些关于夏天的童年往事，时常浮现在我脑海，成为我人生中美好的记忆。

（摘自2024年8月27日《羊城晚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卢沟桥踏上 寻访白求恩之路

□ 李 彦

我出生在皇城根下的景山后街，自幼便熟悉京城的名胜。然而，那座名扬中外的卢沟桥，却直到2015年，才得以进入我的视野。

那年初秋，在古都最迷人的日子里，我带领一支小小的队伍，从加拿大飞到中国，参加一系列重要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队伍中的几位加拿大人，皆为精挑细选的学者、作家、科研人员。他们都是白求恩医生的崇拜者，且每个人都怀着特殊的使命感。

加拿大老共产党员比尔·史密斯是社会活动家，他的父母是加拿大共产党的早期代表人物。在西班牙内战中，其父爱德华曾担任加拿大志愿军旅长，与白求恩大夫的医疗队并肩作战。其母莉莲曾保留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白求恩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照片以及白求恩从晋察冀战场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件，动员她赴华参战。

在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这天，比尔·史密斯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里，把一批珍贵的中国革命历史文物捐献给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完成了父母长达76年的心愿。

丹尼斯·鲍克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在他2006年出版的小说《共产党人的女儿》中，描述了在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华北山区造成的死亡和混乱中，白求恩撰写的一封信令人心痛如绞的长信，信中剖析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

鲍克此行随我来华，希望参加“沿着白求恩足迹”的旅行活动，亲自体验他笔下这位英雄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玛格丽特·雷默博士与鲍克一样，同为作家，还是学术刊物的编辑。在京停留期间，他们参观了鲁迅文学院，对中国作家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极是艳羡。

戴罗尔·勃兰特教授这位著名学者是我的同事。他在美国长大，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为了逃避越战征兵，他于1967年移民加拿大，致力于文化精神领域的研究，担任《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宗教条目的编审。

勃兰特教授是这几位嘉宾中唯一之前到访过中国的人。2012年5月，他曾来山东参加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并调研了中国各种宗教派别，制作用于海外教学的资料。

约翰·摩尔是队伍中唯一的医疗领域人士。他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韦仕敦大学任研究员。其专业领域是在心脏手术过程中采用图像引导的技术，把新型技术转换到临床医学应用中。

摩尔和同事们的最新发明成果是“模拟心脏”，拟用于心脏瓣膜修复手术。整套设备的商业价值是23000美元。摩尔这次来中国，特意携带了这套设备，捐赠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各种捐赠活动结束后，我们来到了卢沟桥。在外国人心目中，这处被称为“马可波罗桥”的景点堪称意义非凡，只因当初那位意大利旅行家曾通过这座石桥步入古都，留下了令人神往的描述。

桥的美丽绝伦映射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心血，自古有无数文字描述过，我不再赘言。代表团成员们纷纷踏上坑洼不平的石板，抚摸着桥栏上精美的雕刻，兴奋地高声喊叫，摆出各种姿势拍照。

我却驻足不前，留在了桥头，深恐我的足迹会加速岁月留痕的磨痕。

我从史料中了解到，白求恩大夫身处太行山两年，消息闭塞，深感孤独，曾十分渴望能去一趟北京。然而，直到他牺牲，这一愿望都未能实现。

沉思间，身边传来一声轻轻的呼唤。勃兰特教授凑过来，主动为我拍摄下了一帧留影。

第二日清晨，一行人告别了京城。大巴下了京石高速，一路朝西，驰往太行山腹地。远方蔚蓝的天幕上，突然闪现出一片形状奇特的山峰，似刀锋锯齿，直刺云天。无疑，那是狼牙山。

我匆匆走到车头，让导游把五壮士跳崖的故事讲给车上的外宾们听。导游杏目圆睁：“狼牙山？没听说过呀！”

我也惊讶。“看你刚才口若悬河地介绍了一大堆河北名胜，怎么竟连这个都不知道！”

见她红了面颊，我不再啰嗦了，拿过她手中的麦克风，指着窗外，用英文讲了狼牙山那段历史。话音刚落，比尔·史密斯就喊道：“谢谢你，彦！这才是我们想听的东西！”

步入晋察冀烈士陵园，看到镌刻在墓碑上的成千上万个名字时，一路谈笑风生的丹尼斯·鲍克沉默了，跟随大家，在白求恩衣冠冢前，一圈圈绕行，悼念那个不朽的英灵。

接着来到了葛村，在那个简陋粗糙至极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小院里浏览时，约翰·摩尔问，白求恩如何解决他的卫浴需求呢？

导游指指角落里那个茅棚。进去看过，出来时，人人都变了神色。

“彦，假如没有坚定崇高的信念，一个西方人，是很难在这种地方生活的，哪怕仅仅是几天！”玛格丽特·雷默对我感叹。

暮色中，村里的男女老少纷纷走到路边，与代表团挥手道别。大家给孩子们的胸前都别上了一枚白求恩纪念章。

回到加拿大后不久，我与勃兰特教授商议，编辑出版了一本英语合集《重读白求恩》。10位加拿大与中国学者，从诗歌、散文到学术研究，为人类共同的追求，阐述了真诚的心声。

正如天津作家任芙康所说，“白求恩长垂青史的殊荣，如蓝天辽阔，海洋浩瀚……许多年来，白求恩始终不曾离开我们。”

（摘自2025年7月7日《人民日报》）